

郁达夫在申城“春风沉醉的晚上”

朱少伟



郁达夫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今日尚贤坊 黎洛埃 摄

上海南京西路与常德路交叉口的越洋国际广场，昔为嘉禾里，不少文化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我最近路过这里，不由驻足沉思：“反法西斯文化战士”郁达夫血染南洋已80周年，这位现代著名作家也在此留下了生动故事……

“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

1922年7月20日，郁达夫结束了在东瀛的留学生涯，乘船归国。留日期间，他曾在日记中慷慨立志：“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

从这年8月8日起，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血泪》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连载，其中写道：“我的异乡飘泊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回到上海的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在三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知被谁拿去了”。这实际也是一种蕴含怨愤的自述，他刚抵沪时有过类似的遭遇。

落脚申城期间，郁达夫回首以往，深感生活艰辛，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并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经历，如他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描述：“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作者注）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棟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今丹徒路，作者注）中间，日新里（后为唐山路416弄，作者注）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走，走到天明的时候才回家”“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眼闭了。对面日新里的

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巴拉衣加（俄文音译，即弦琴，作者注）”。

1923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继两年前出版郁达夫最早的文字集《沉沦》（“创造社丛书”第三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后，推出他的第二个文学集《茑萝集》（“创造社‘辛夷小丛书’之三，小说、散文合集”）。

同年秋至1926年冬，郁达夫因生计所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4月后为武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其间，他曾回申城，筹划出版自己的教学讲义《小说论》。沈松泉的《回忆郁达夫先生》说：“1925年冬，有一天达夫先生到光华路来，我正好在店里，他看见我就说，‘松泉，我有些急用，需要一百元钱，我这里有部稿子给你，就算是稿费吧。’说着，他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卷稿子来。这就是他在武昌师大的讲稿《小说论》。全稿分量不大，不过二万字左右，是他用钢笔字写的手稿。”

“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

1926年底，郁达夫重返申城，负责创造社出版部，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在《洪水》半月刊“编辑后”中，他申明刊物的使命为“在这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赴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探望留日同窗孙百刚，在其家中邂逅王映霞（她与孙百刚夫妇合住一套房），一瞥惊为天人。这天，郁达夫的日记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而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说：“（那天）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则谈道：“在我的记忆里，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玩、吃馆子，也有好多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今天掌华（孙妻，作者注）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却很是热络”“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今长江剧场，作者注）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

翌日下午，郁达夫参加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礼。晚上，他情不自禁又去尚贤坊孙家，把王映霞约往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馆子一起用餐，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

由于郁达夫的热情和才华，王映霞的芳心慢慢被打动。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的感情已比较深厚，遂于6月订婚。

到9月，郁达夫将自己的部分日记（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整理成《日记九种》，交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这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该书的《后叙》说：“半年来的记录，全部揭开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我也不必在此地强词掩饰。”

郁达夫用文学的笔法写日记，其中披露了他与王映霞恋爱的许多细节，可读性强，颇为畅销，重版达十余次。该书具有

不可替代的史料性，对于研究郁达夫及其文学心理具有重要价值。

“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

1928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举行婚礼，才子佳人的结合轰动了申城。

接着，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后为常德路81弄）租房。这里的一幢两层房屋由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出资建造，前弄为东洋式住宅，无天井；后弄为石库门房屋，有天井。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号属于条件较差的前弄，使用面积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光线比较充足，从亭子间南窗望出去是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一座座坟墓上的大理石“安琪儿”都看得挺清楚。王映霞的母亲借住于嘉禾里1442号，属于条件较好的后弄。

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提及“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在屋子里面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散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王映霞的母亲搬出后，夫妻俩便改租嘉禾里1442号，直至离沪。

那时，王映霞初为人妻，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煮饭不知道该放多少米、放多少水，烧菜不知道该放多少油、多少盐，常出洋相。在王映霞正忙脚乱之际，郁达夫可能恰好写出一段好文章或一些妙诗句，他会跑到灶间里来把妻子

拉上楼，让她先看一遍、读一遍，这样一顿饭有时要做两三个小时。于是，郁达夫提出：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他带着王映霞到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去品尝了几天，把一个月的稿费全用光了，她仍未学会烹调。王映霞并没有气馁，通过反复实践学会了烧菜，而且还能缝纫、洗衣等。

傍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到树下散步。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有时会遇见从曹家渡过来的独轮车生意，他们便分坐在车的两侧，手牵着手，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车人聊着天，真是别有情趣。回到家里，两人往往依然很兴奋。

“我曾代郁达夫写信给鲁迅”

寓居嘉禾里的近5年中，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生活虽不太宽裕，却也温馨。

当年，郁达夫并未只顾小家，而是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化活动，他曾创办《大众文艺》月刊，发刊词中表示：“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郁达夫还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与钱杏邨合编《白华》半月刊，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团结全国文化界，作为反帝抗日之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的反帝组织”。1932年2月3日，郁达夫同茅盾、鲁迅、胡愈之等43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炸毁了上海华界的重要工业、文化机关和繁盛街市，中国民众死在日军炮火下者，已数千人”“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人民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

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

鲁迅曾前往嘉禾里造访郁达夫。郁达夫在北京时，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抵达黄浦江畔，定居上海，鲁迅与郁达夫的联系更密切，诚如王映霞在给陈漱渝的信（1976年9月8日）中所说：“在上海的这几年，他们间的友情是更增加了，见面时可以说无话不谈，虽如此，但郁达夫对于鲁迅，既尊敬而又诚挚，无论在人前人后，我从未听见郁达夫对于鲁迅先生有什么不尊敬的言辞，在郁达夫的口中这是很特殊的。”正因如此，鲁迅才会去嘉禾里与郁达夫交谈。《鲁迅日记》在1932年2月25日有“晴。午后同三弟造访达夫”，7月12日又记“晴。上午……访达夫”。

鲁迅赴嘉禾里做客的情况，王映霞在《我记忆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中提及：“我和郁达夫住在嘉禾里1442号时，我曾代郁达夫写信给鲁迅，约他来玩，那天他来后，就与郁达夫天南海北地聊天，我则到厨房里去做菜。”

1933年4月，郁达夫偕王映霞移居杭州，他的《移家琐记》说：“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1936年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新居“风雨茅庐”落成。由于多种原因，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12年。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当选理事。他曾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和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年底，郁达夫应邀前往新加坡，接编《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抵达后第二天，他就写了政论文《估敌》，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此后，郁达夫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3年多时间里共发表400余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成为敌人的眼中钉。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胡愈之等28位文化界人士转移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宪兵却趁盟军尚未接管苏门答腊的间隙，8月29日晚，把郁达夫从家中带走，并于9月17日秘密杀害郁达夫。郁达夫殉难时年仅49岁。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是“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写着：“郁达夫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经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诚如胡愈之所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记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记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在郁达夫从文学巨匠到抗日英烈的足跡中，上海无疑是一个重要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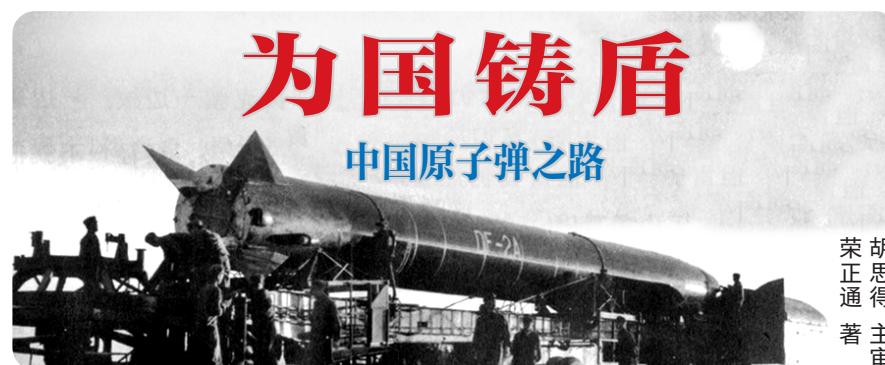
转场罗布泊

对于勘察队员来说，副食供应更加困难。新鲜蔬菜拿到手时都变成了干菜和烂菜，肉类只有少量的咸肉，此外只有榨菜和葱头。因为缺乏维生素，很多人得了维生素C缺乏病、口角炎、夜盲症，但是他们依然带病坚持工作，没有一句怨言。

茫茫戈壁滩上的地形地貌几乎一模一样，到处都是灰褐色的砾石，没有明显的标志物，一旦起了风沙，人们很容易迷路。有一次，勘察大队队长张志善和副队长史国华等6人乘坐两辆小汽车外出返回时遇上沙尘暴，结果迷失了方向。他们摸索到半夜，还是没有找到指挥部，只好停车休息。等到第二天天亮时，风沙停了，他们发现休息的地方离指挥部只有不到1公里远。

在他们失踪的那天晚上，整个指挥部都睡不着觉，同志们焦急地朝天鸣枪，打曳光弹、信号弹、照明弹，想给他们指引方向，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他们安全回到指挥部后，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又是哭，又是笑。张志善死里逃生后风趣地说：“同志们放心吧，我们搞不出原子弹，马克思是不会接见我们的。”

经过3个月的艰苦奋斗，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到1958年10月下旬基本结束。10月27日至11月7日，陈士渠率领由工程兵设计院、一机部四院和总后营房部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原子武器试验场各分区的位置。原子弹爆心定在敦煌市区西北方向直线距离130~150公里处。指挥部距离爆心60公里，距离敦煌市区80公里，生活区在敦煌



为国铸盾

中国原子弹之路

胡正通著 主审

西湖农场，距离敦煌市区大约10公里。

10月下旬，到西北视察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鸣沙山下接见了常勇和张志善。张志善习惯性地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队的。”彭德怀听了哈哈大笑：“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弹靶场嘛。”

10月29日，原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大校抵达敦煌，就任0673部队主任。他发现试验场设计为只能试验最大当量为2万吨TNT的原子弹，感到非常惊讶。美国在1954年就已经试验了当量为1500万吨TNT的氢弹。苏联专家的设计意味着中国只能试验威力相当于“小男孩”的原子弹，换句话说，苏联专家希望把中国的原子弹技术限制在美国1945年的水平。

回到驻地后，张蕴钰向常勇、张志善等指出，这个试验场存在很多问题：最大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未来没有发展空间；距离敦煌市区太近；地质条件不好；100公里内没有水源。他建议另外选择一个更理想的原子弹试验场。赶回北京后，张蕴钰向安东、陈士渠和万毅分别汇报了勘察情况和换址建议。副总参谋长陈赓主持

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张蕴钰汇报了敦煌原子弹武器试验靶场的情况，陈赓随后拍板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吧！”

凑巧的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于1958年11月21日函告中国方面：经研究分析所掌握的与中国毗邻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推断已选定的靶场的高空风向是自西北吹向东南，敦煌地区正处于其下风向。建议中国考虑把该试验靶场移到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可能性。

1958年12月初，聂荣臻在武昌听取万毅汇报。万毅提出，拟组织有关人员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勘察，看是否可作为原子弹武器试验靶场新的场址。聂荣臻听后说，同意派人对罗布泊地区进行勘察，查明建场条件，选择合适的建场方案，以便与已选好的敦煌场址进行比较。在综合中苏两方面的建议后，总参谋部在同月批准了0673部队向罗布泊地区转场的报告。12月22日，张蕴钰率队赴罗布泊进行实地勘察。途中，张蕴钰不由得想起汉朝时期发生在罗布泊附近的两个故事，分别是西汉的傅介子计斩楼兰王和东汉的班超歼灭匈奴使团。一想到自己也将在这片土地上

建功立业，张蕴钰顿时豪情万丈，心潮澎湃。他随后就以傅介子和班超的故事鼓励勘察队员克服困难，再立新功。

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最低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由于形状宛如人耳，罗布泊被誉为“地球之耳”，又称作“死亡之海”，《山海经》称之为“幼泽”，也有盐泽、蒲昌海、牢兰海、临海、罗布泊等名称。罗布泊有着古老而传奇的历史，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罗布泊地区曾经有过一个人口众多、颇具规模的楼兰（鄯善）王国。它于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元630年消亡，有800多年历史。由于气候变化和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罗布泊的水域面积从1942年的3000平方公里缩小到1962年的660平方公里，并在1972年彻底干涸。

20世纪50年代末的罗布泊尚未干涸，但因为是咸水湖，所以湖水不能直接饮用。罗布泊周围的泉水很少，水质矿化度极高，又苦又咸。罗布泊地区的自然环境比敦煌地区还要恶劣，全年几乎没有降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但是风向合适，而且方圆数百公里人迹罕至。只需要把少量的当地人迁走，就可以在那裡进行较大当量的原子弹、氢弹试验。1959年3月12日，中央军委批准在罗布泊建设原子弹武器试验靶场。随后，1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片沉寂已久的荒漠，开始艰苦卓绝的基地建设。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弹武器试验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政委常勇为第一书记，司令员张蕴钰为第二书记。

夏季的罗布泊白天烈日炎炎，酷热难耐，最高气温可达50多摄氏度，夜里则直线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冬季的罗布泊寒风刺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多摄氏度。

（三十六） 连载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